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第84期（民國103年6月），207-216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黃自進，《蔣介石與日本：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》
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2。470頁。

王震邦*

借用蔣介石在1943年以黨國領袖身分推出《中國之命運》作爲投射角切入，不論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宣言「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」，或孫中山遺囑要求同志戮力於「廢除不平等條約」，皆在追求中國之統一，即追求「中國之命運」。就對外關係而言，蔣介石的崛起，以當時「中國之命運」論，幾乎和日本、美國、前蘇聯的對華政策相始終；退守台灣的處境也與美、日息息相關。在蔣介石掌權的時代，皆曾與美、日、蘇有過短暫的交好，但從未能從這三個國家取得長期互信，或爭取到充分支持。畢竟這是國際現實，但淺學者難免疑惑，難道蔣介石和「中國之命運」存在悖論？

蔣介石曾親訪蘇聯，也曾講過民生主義是通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，有左派色彩，對蘇聯既有期待也有反感，期待蘇聯支持國民革命，反感蘇聯支持中共奪權，且思染指中國領土；清黨之後國共長期鬥爭，對蔣來說更是芒刺在背，可視爲生死之爭。抗戰期間中、美幾爲「劍拔弩張的盟友」，蔣憤而有「美帝國主義之凶橫」語；戰後美國眼見國共內戰逆轉，發表《對華政策白皮書》，對蔣而言，自亦是點滴在心頭。至論和日本的關係，蔣從革命階段的寄予厚望，到北伐期間親身經歷日本發動的濟南慘案，又不得不屈以求伸；八年抗戰的慘勝，已是民窮財盡，國共內戰接踵而來，蔣介石一生事功從最高點直落谷底，對來自日本的負面影響豈能無憾、無恨。

* 玄奘大學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副教授

身爲革命領袖，蔣介石如何肆應或和這三個國家打交道，通過此一歷史考察，不僅可以重新得出蔣介石的歷史地位，也可以看到世變軌跡，而這正是史家的責任。戰後的冷戰格局，對歷史研究難謂沒有限制，隨著冷戰解體，史料解密，史學工作者的空間愈來愈寬廣。〈蔣介石日記〉（以下簡稱〈日記〉）陸續公諸於世，不僅得以更客觀地重構蔣介石的歷史形象，連整部中華民國史都得立足於〈日記〉重新審視，始能更逼近歷史眞實。

研究「蔣介石與日本」以及「中國之命運」，要自成一家之言易，而能贏得學界重視實難。對此，筆者以爲至少要有三長和一個突破點。三長分別指對中、日歷史文化背景、當時現實政治環境以及蔣介石本人有深度掌握。突破點則爲能否善於運用新出史料，排除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干擾；非如此，無以得出新的歷史認識。

以此爲準，作者黃自進轀藉其多年來對日本方面的研究和深刻認識，而爲日本學界看重，就史家的知日條件言，自不遑多讓。就從事蔣介石的研究言，作者二十餘年來投入對「蔣介石與日本」的研究，發表多篇論文；加上能沉潛於挖掘中、日相關史料及研究成果，作者於書中即言，「與日文史料相較，中文史料留下許多空白」。既有自信，也展示個人長處。此外，親赴美國史丹佛大學閱讀新公開〈日記〉、參與編輯《蔣中正總統五記》（日記的分類抄本）。作者以此爲基礎，至少已取得突破性的機先。

以下茲就作者於「蔣介石和日本」此一概括性命題所呈現的新觀點和新解釋作一簡述，藉供討論和商榷的依據。

本書首章，始於蔣介石的留日機緣，結識孫中山，並獲其青睞，得以傳承革命事業。另得出蔣介石一生事功發軔，在不同時空背景下，即具多重日本因素和愛恨情仇。1919 年奉孫中山之命第五度往訪日本，進一步接續了孫中山在日本長年經營的人脈，在兩代革命領導人之間，多少具有嫡傳的象徵意義。

第六次，也是蔣介石最後一次訪問日本，雖是下野之身，實是國民革命軍無可替代的領袖，和當時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晤談，各逞機鋒的同時，兼具分庭

抗禮之勢。也正因為蔣和日本的淵源深厚，戰後以及退守台灣，日本因素依然是關鍵。以此觀照蔣介石一生事功，即大可闡而述之；作者的意圖亦即聚焦於此。

依蔣氏崛起後中日之間的歷史大事為經，作者從第二章開始，依時序脈絡，分別從「北伐」、「九一八事變」、「華北危局」、「全面戰爭」、「戰後布局」五個大段落鋪陳。從而呈現蔣氏如何爭取日本的支持，又是如何對應日本的挑釁。這既有民族主義的面向，也有蔣個人之於領袖地位的追求；作者也成功傳達出：蔣介石何以在心態上高度評價日本的國民性及現代化的成就，大有以敵為師，尋求中、日兩國世代友好而不可得的矛盾情結。

從北伐時南京事件到濟南事變的「化友為敵」，蔣意圖以反共作為中、日交涉的雙贏策略，但無法充分滿足日本利益，這是蔣與日本交涉的痛苦經驗，就實力言更是以下駟對上駟。作者推斷，正由於蔣介石接收了孫中山在日本方面的人脈，以及蔣在黃埔練兵，以反共姿態取得軍權和政治地位，日本方面此時相關蔣介石的情報皆有正面描述。北伐軍進入南京城，隨即發生南京事件，因為日本方面對蔣已有理解，認定整起事件出於共黨預謀；且正值日本幣原外相標榜「不干涉內政」，把原來英、美、日三國抗議擴大為英、美、法、義、日五國，逼使英國放棄軍事封鎖和武力報復，無形中沖淡了抗議的力道。蔣因此得以放手清黨。

蔣廷黻晚年擔任駐美大使時曾向公使沈錡論述列強的不同態度，「北伐在華南開始時，國民黨獲日本支持，而英國反對，但一到長江流域，則獲英人支持，而日本反對，這都與他們的勢力範圍有關」。〔沈錡，《我的一生：沈錡回憶錄（四）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0），頁 98〕作者追索其間的因果關聯，雖然沒有直接證據，但認為蔣介石為南京事件和日本交涉的同時，日本非僅意識到寧漢分裂係屬意識形態衝突，也認知到應樂見蔣介石清黨。就蔣的崛起而論，借助日本的反共情結，自具關鍵意義。

從南京事件到日本出兵濟南阻攔北伐，接著發生五三慘案，蔣介石和日本的關係急遽變化，日方雖然強調防赤，但更在乎日本設定的勢力範圍及認定的

在華利益。也因爲日軍對中國的凌辱，蔣在〈日記〉中改稱日軍爲倭軍、日本爲倭寇。陶涵（Jay Taylor）在其新著《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》（*The Generalissimo：Chiang Kai-sheh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*）中即引作者此書出版前的未刊稿，指出濟南事變證明蔣的新發現：日本是蔣介石和中國的最大敵人。此外，兩岸學者過往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研究皆側重抗日的一面，作者則點出，除極少數英勇抗爭和犧牲外，東北軍非僅無力且無心抵抗。事變初期 20 天，東北軍投降者將近一半，其後且多接受日方或僞滿收編。各地維持會也紛紛成立，主要成員幾爲張作霖系統，特別是楊宇霆、常蔭槐所部官僚，以及因配合日本經濟開發事業而致富的新興實業階級。再以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爲例，9 月 21 日開城迎敵，28 日宣布「獨立」，10 月 6 日向關東軍提供 30 萬元政治獻金。作者認定熙洽根本就是「關東軍預埋的伏線」。

作者利用日文外交文書補充說明，蔣介石當年 12 月 15 日下野，寧、粵從對立轉向和解，日本首相犬養毅派出萱野長知和代表粵方的居正交涉且有初步結論，即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負責維持東北秩序，並嚴懲張學良。此議以當時日本政治氛圍，固完全不可能付諸實踐；但張學良獲知後，爲保存實力，隨即棄守錦州，東三省始告淪亡。作者在此提出了一個歷史質疑和考驗，即「不抵抗」政策當時有無底線。

作者指出，蔣介石原寄望通過大量採購日本軍火，禮聘日本軍事教官，甚且和日方交涉合建兵工廠，爭取日本支持剿共。是以九一八事變初起，蔣以爲僅是零星的軍事衝突，只要控制得宜，或可轉圜。

至於蔣得以肆應華北危局的弔詭之處，在於日方決策的文武殊途，軍方內鬥讓蔣得以施行金蟬脫殼之計，或藉由「表態」反共，化險爲夷，從而爭取緩衝。並於剿共之際，也讓蔣得以「經營西南」。蔣的失誤則在對日本軍方動向的觀察和判斷，預判「日蘇先戰」，且有意引誘蘇聯刺激日本開戰；但與實況大相逕庭，「安內攘外」原期「剿共抗日」的戰略構想也隨之破局。

蔣介石在 1934 年 3 月 7 日在南昌演講〈中國之邊疆問題〉：「十九年中俄戰爭發生後，予曾有電致張漢卿氏，主張退至長春以南默許蘇俄勢力南進，蓋蘇俄如進至哈爾濱以南，必與日本發生衝突，再進至長春以南則衝突必特別嚴重，吾人在實力不夠時，依此以造成在東三省兩強相防相制之均勢」。作者指陳，這是蔣氏有意藉此導引日、蘇直接對抗。

同年 7 月 13 日，蔣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演講〈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〉言：「日本的軍事準備，……陸軍的目標是蘇聯，海軍的目標是英美。日本為要併吞我們中國，而須先征服俄羅斯，吃下美國，擊破英國，才可達到他〔此指：獨吞中國，獨霸東亞〕的目的」。20 日，蔣續就〈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〉開講，「日本……將來和蘇俄作戰之前，一定先要佔領我們內蒙和華北各地，然後他在戰爭中才可居于穩固而有利的地位，才容易戰勝蘇俄」。

作者比對日方 1907 年的〈國防方針〉，第一假想敵就是俄國，1918 年、1923 年、1936 年，假想敵順位調整為美、蘇、中（1936 年再加入英），戰略目標為南北並進，陸軍仍以對蘇作戰為目標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於 1936 年 6 月為世界大戰必要進行持久戰所擬定的〈國防國策大綱〉，作戰步驟先求消除北方威脅，以徹底摧毀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力量為首務。

1936 年，蔣對日蘇開戰之期待達到高潮。先是 3 月 12 日，蘇聯與外蒙簽訂《蘇蒙互助同盟條約》。3 月 14 日，蔣在〈日記〉中言：「世界戰爭必起於倭俄，以其意在促成俄、德戰爭，且以為倭俄開戰，則德必乘機攻俄也」。3 月底，日、蘇邊境零星衝突隨之增加，蔣介石注意到此一情勢，「為從來所未有」。甚至認為，「俄蒙協定宣布之日，實即倭俄戰局完成之時」。還想利用蘇聯和日本鷸蚌相持之勢，甚至有不惜與日本結盟的念頭。但很快地，蔣發現日蘇緊張情勢「始急終緩」。

蔣精心設計的「剿共抗日」不僅止於字面上的「安外攘外」。作者引蔣 1934 年 12 月 29 日〈日記〉，「若為對倭計，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，避免內戰，使倭無隙可乘，並可得眾同情」。作者據此形容：蔣的剿共具有「一

石三鳥」之效。一則可消滅反側；二則削減地方勢力；三則可迴避對日作戰。

在處理抗戰階段「蔣介石與日本」的議題上，作者頗費工夫地比較日軍在中國內地和東北的兵力部署，意在說明日本更重視防蘇以及準備對蘇作戰。1941 年，抗戰進入第六年，日軍投入中國內地的兵力有 61 萬 2 千人；但日軍部署於東北的兵力竟高達 64 萬 9 千人。作者據此認爲，從日軍部署可充分證明日蘇大戰可能一觸即發，間接證明蔣氏判斷有憑有據。

華北危局和蔣介石的「安內攘外」，如同九一八事變的「不抵抗」政策，論者多矣，作者在詳略之間，大量利用〈日記〉以及日本方面的史料詳加比對，指出蔣當時的戰略部署「首重華中地區，華北其次，東北再次」。易言之，蔣視華中爲直轄地盤，剿共與保衛華中乃一體之兩面，除了意識形態之爭，「中共在華中地區星羅遍布根據地，直接威脅他的核心權力基礎，亦爲重要考量」。

在《塘沽協定》及後續應對上，蔣堅持不立正式文書，只接受局部停火協議，更不能涉及東北。但牽連所及，既有關內關外通車、通郵問題，還有日方要求的華北自治。國府方面也就前後推出「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」、「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」、「軍事委員會駐平辦事處」、「冀察政務委員會」，但求在名分上不失主權，作者形容這是「金蟬脫殼」之計，且可避免華北失控。

比較精彩的是作者看到蔣介石因能通過不同管道取得日本情報，得以掌握日方內部矛盾。是以華北危局看似日本關東軍和天津軍在華北不斷滋事，但來自日本軍方不同派系如「皇道派」和日本軍部的情報，同時讓蔣了解關東軍在華北的蠻橫霸道，只是有限度的行動；而軍部也只承認以長城爲其邊境線，逾線不予支持，是以蔣只要在適當時候「表態」即可勉強過關。

從表象看，日本在華北步步進逼，蔣則是一再退卻。其實蔣從退卻中爭取到不少緩衝時間，且能從退卻中爭取主動，具體表現就在剿匪方面，並找到「經營西南」的把握和自信。

蔣介石的謀略具現於作者所引 1933 年 8 月 17 日的〈日記〉，「大戰未起之前，如何掩護準備，使敵不甚注意，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」。翌年 12 月

29 日續言，「若爲對倭計，以剿匪爲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，避免內戰，使倭無隙可乘，並可得眾同情，乃仍以親剿川、黔殘匪以爲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」。據此，作者說法應可成立，就蔣介石言，不論對付日本或是剿共都達到了階段性目標。

八年抗戰始於七七事變，如何應變危局，蔣的〈日記〉有充分記載，可以近距離觀察傳主所思所想。事變最初幾天，作者引蔣氏〈日記〉，直接涉及蔣的對應和決斷。7 月 8 日，蔣提出四個設想，即：「一、倭寇在蘆溝橋挑釁，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，使我屈服乎。二、與宋哲元爲難乎，使華北獨立化乎。三、決心應戰，此其時乎。四、此時倭與我無開戰之利」。拖到第四天 7 月 10 日，認爲已到「存亡關路」，「如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，則不能和平解決也」。14 日：「建國要在困難中實施，不可以倭患而中止建國工作也。一、對蘆案英美已有合作調解趨勢。二、宋住津態度不定，可知其果爲倭寇軟化，受其欺乎」。8 月 4 日的《困勉記》：「平津既陷，人民荼毒至此，雖欲不戰，亦不可得，否則，國內必起分崩之禍，與其國內分崩，不如抗倭作戰」。

在〈日記〉中，蔣所考慮的不僅是蘆溝橋及周遭形勢、近期兵力部署、日方情況，還考慮到守將宋哲元的心理狀態以及國際調停的可能，若長期抗戰，建國工作不可中止。若無〈日記〉，只能從官方檔案比對，這就很難如聞謦欬，並從蔣的心理以及對局勢判斷的過程，進一步還原並逼近歷史現場；歷史的精彩呈現就當如是追求。

作者另從日方資料指出，日本軍部初期也有爭論，但主戰者以徹底控制華北有利於增強對蘇聯戰備的論調占上風。蔣最初幾天固然還在觀望事態發展，但已無意再事妥協，也正是「一石三鳥」的設計破局，代之而起的是國共統一戰線，作者以「今非昔比」形容形勢已經轉移。

國內過往研究八年抗戰的論著，多偏向中國方面的戰略部署，作者發揮掌握日方資料的優勢，將日本的戰略部署分爲「軍事決戰期」、「政治主導期」、「封鎖邊境期」、「太平洋戰爭期」等四個階段；對應於中方的全面應戰則區

分爲五部曲，即「政略與戰略的並用」、「上海出擊」、「華中防禦」、「以緩應急」、「苦撐待變」。

作者對日軍的評價是：初期的「輕敵」，後期則陷於戰略、政略的連番錯誤。「封鎖邊境期」原想封鎖中國，不料引來英、美等國的禁運及反封鎖，且倉促發起「太平洋戰爭」，作者引日本參謀總長秋山元在御前會議的發言：「北方地區的冬季酷寒，不宜用兵，實屬保證日蘇互不侵犯的最佳緩衝期；就此而言，爲避免陷入兩面作戰，冬季正宜向南方進軍」。直接證明日軍戰略思維短淺。

戰後「以德報怨」非平空而來。作者認爲主要是蔣不念舊惡，且寄望世代友好。最具體的事證就在遣返日本軍民，以中方提供的待遇爲最佳；蔣也策略性的利用日軍協助接收，這是另類收編外籍傭兵。蔣退守台灣長期借重日本軍官協助練軍，即繼承此一脈絡而來。

蔣介石崛起時氣勢逼人，自視黨國和領袖應如同一體；晚年在台灣，除仰仗美國主導的冷戰格局和美援，一個鮮明的對照則爲力求保存參與國際社會的代表權而不可得。日本因素之於蔣介石，恰恰正說明了歷史的冷酷。

綜觀全書，就作者所關照的主題論，以大量來自日本的史料和研究成果，輔以新出土的〈蔣介石日記〉，這是難得的雙重優勢，但也是挑戰，即有無新觀點和新解釋。作者解釋蔣的「反蘇剿共」藏有一石三鳥之計，處理華北危局而有「金蟬脫殼」之計，都是出於蔣的謀略，也是作者描述史實之際得出的新解。

作者對中方歷史學者過往不欲多言的陰暗面頗有著墨，例如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民在迎拒之間，多有傾向日本者，以及南京汪政權夾處日方和重慶之間的反共情結，糾結出「曲線救國」。這同時寓示，「蔣學」不再是「險學」，有助於全面認識史實。

此書也有間接澄清若干史實的作用。例如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臼井勝美的訪問，認爲當年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並未參與策動九一八事變，張學良引本庄繁自言，本庄繁若預知，不會讓事變發生，且有兩三天不知該怎麼做，讓好些人得以逃出東北。相較本庄繁早在 1926 年即以日本駐中國公使館武官身分，向

日本陸軍省次官提出〈向中國開戰動機之研究〉，赤裸裸不加掩飾地視中國東北（滿蒙）和華北皆攸關日本帝國的生死存亡。是以本庄繁沒有預知到九一八事變的發生，並不意味他個人反對日本占有東北，而是策略不同。

至論中、日兩國未來的發展，作者有意傳達中日未來應世代友好，肯定蔣介石戰後所持「以德報怨」的態度。但就日本官方處理中日近代關係史的歷史解釋和態度，作者的寄望頗有待後續考驗。

本書立論值得商榷的至少有兩點，一是蔣期待日、俄發生大戰，但畢竟沒有發生。作者相當肯定蔣的期待，認爲蔣具有戰略高度，有睿智；但若比對〈日記〉，可以發現蔣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常有個人偏執。日俄關係固然險惡，但推斷「即將」大打出手，也只能是一廂情願而已。作者通過〈日記〉研究蔣介石對《德蘇互不侵犯條約》的反應，又認爲蔣有「日蘇必戰情結」，從「睿智」而爲「情結」，必有商榷餘地。

從反面觀察，日本席捲東三省和熱河，蔣既有假手蘇聯以制日的想法，不能不追問，蘇聯何以未有大動作？也不能不追問，何以蘇聯和日本妥協？中共又緣何轉而聯蔣抗日？事後觀察這是史達林爲免東西兩線作戰，不因蔣介石剿共而改變，依然認定有必要支持蔣的領導地位，這就是一個戰略選擇。中、蘇於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年恢復邦交；1935 年，中共從莫斯科發出「八一宣言」，要求停止內戰；在史達林的干預下，西安事變得以和平收場，國共再次走向合作；七七事變後，中、蘇簽定《中蘇互不侵犯條約》，史達林也願意提供並擴大軍援，但拒絕結盟。這些都出自史達林的策略運用，謀略豈不更見深沉。

其次，以東北軍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論，作者舉證東北軍接近一半在 20 天內投降，但又接受劉維開《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：從九一八到七七》的論證，「尤其是九一八事變時期原不及撤退的東北軍，大部化成東北義勇軍，仍留在東北打游擊」。雖然劉維開所指係不及撤退的東北軍，而非投降的東北軍，但投降者難道沒有不及撤退者，若能有一較詳細的交代，至少可以爲讀者釋疑解惑。

再如蔣處理蘆溝橋事變的心理歷程，既然史料俱在，似乎可以更細膩些。例如 7 月 1 日，即事變發生前六天，蔣在〈日記〉中已有不惜一戰，以戰止戰的決心：「中國自強之意義與責任，應具必戰之心，而後可以免戰，乃得達成不戰而收復失地之目的」。楊天石更推到 1936 年西安事變發生前的綏遠抗戰，論證實由蔣介石主導。

蔣有決戰之心，但圍繞在蔣身邊的人物，各有不同心思和觀察，主和、主戰之外，還有不同的對應姿態和反應。例如吳景平的論文〈蔣介石與抗戰初期國民黨的對日和戰態度：以名人日記爲中心的比較研究〉（《抗日戰爭研究》，2010 年第 2 期，頁 131-144），通過陳布雷、胡適、王世杰、張嘉璈、王子壯、周佛海的日記，更近距離地描繪出蔣在廬山發表對日抗戰文告的前後景況，更能看出蔣的領導風格和意志。

九一八事變當日，東北軍選擇不抵抗，然而「不抵抗」的定義，究竟是指一時一地，還是東北全境，數十年來論究九一八事變的史家似皆未曾專題處理。1933 年熱河淪陷，次年 7 月 13 日至 24 日，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發表演講，即稱「九一八東三省」；熱河淪陷後，則改稱「日本現在強佔了我們東四省」；12 月，假徐道鄰的名義發表〈敵乎？友乎？〉，也明確指稱熱河爲東北第四省。對此，作者點出蔣的結論，「收復東北，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，但失去東北，革命黨不負責任」。當時輿論交相指責的「不抵抗」政策，蔣顯然不願意承受。但「不抵抗」的底線該怎麼認定，作者其實看到了，卻吝於處理。

就命題和結構言，「蔣介石與日本」是一個對稱題，副題爲「一部中日近代關係史的縮影」，惟作者將重點集中在蔣介石身上，在評介相關論著時，純以蔣傳爲主，而缺乏中日關係的論述。雖然這是作者的設定，然而，蔣介石站在歷史舞台上，若有一幅可以鋪陳近現代中日關係的背景，豈不更能顯豁蔣介石的形象和影響。

總之，本書以「蔣傳」論，僅及若干側面；以「蔣學」的歷史研究論，則往前推進了一大步。